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热点透析

美国重返东南亚背景下的南海争端

对中国来说，南海问题涉及中国的领土主权，也涉及国家安全和发展，因此与国家核心利益紧密相关。中国应坚持既定原则继续加强同包括南海争端国在内的东盟的全方位合作。

□ 刘建飞

连日来，南海问题成了中美战略博弈的最前线和举世瞩目的热点。对南海争端，我们既要看清其战略背景，也要理性认知其地位与危险性，进而明确一个基本原则：各方应本着合作共赢的精神，有效管控分歧，抑制争端升级。

美国重返东南亚是当下南海争端的主要动因

南海问题本是个老问题，已存在了几十年，本轮发酵的主要动因是美国重返东南亚。

长期以来，在“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的指导下，中国与南海周边的东南亚国家都和谐相处，在领土海洋权益上的纠纷都得到有效控制，《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也得到了较好贯彻。自美国宣布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并将“重返东南亚”作为该战略的重要一环后，南海就失去了以往的平静。个别南海争端国试图借助美国力量平衡中国，谋求固化其对侵占岛礁的“主权”，甚至进一步扩大在南海的权益，从而引发几波“南海危机”；美国不仅在外交上放弃过去的“不介入”立场，一再公开偏袒其盟友或“伙伴国”，站在中国的对立面，而且还不断强化其在这一海域的军事存在；域外其他大国，特别是日本，也开始以更积极的姿态“搅混水”。南海局势突转复杂。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崛起是南海问题发酵的间接动因。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实力的增强，中国在维护领土领海权益上必然要更加有所作为，尽管中国依然寻求以和平的方式维权，但难免会刺激相关争端国采取相应的举动。出于各种原因，一些周边国家将同中国有争议的领土、领海权益视为其重大国家利益，试图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以期在有争议问题上获取更大的利益，并且借助域外大国的力量来平衡中国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崛起构成美国加快“重返亚太”步伐的重要直接动因。“9·11”后，美国将反恐作为全球战略的第一要务，在地缘上以大中东地区为重心。但是，对美国来说，恐怖主义只是皮疥之疾，崛起大国才是心腹大患。而中国恰恰是在美国深陷反恐战争之“战略机遇”时迅速崛起的大国。奥巴马上台后很快提出“重返亚太”，以应对中国崛起，而中国边海问题自然成了美国牵制中国、拉拢亚太盟友及其他与中国有争端国家的绝好抓手。

各方要认清南海问题的地位及危险性

从南海争端各方的诉求来看，南海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争端各方当务之急是理性审视南海问题在各方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中的地位。

对中国来说，南海问题涉及中国的领土主权，也涉及国家安全和发展，因此与国家核心利益紧密相关。中国应坚持既定原则继续加强同包括南海争端国在内的东盟的全方位合作。至于美国等域外大国，发展同它们的伙伴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对美国来说，“重返亚太”只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中东、欧洲仍然是美国霸权战略不可丢弃的战略地带。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的力度会随着中东与欧洲情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而作为“重返亚太”战略一个环节的东南亚和南海，不可能成为美国倾全力而作为的区域。在美国国家利益的光谱中，东南亚绝不在核心利益范围内。对东南亚的南海争端国来说，南海领土、资源等虽然非常重要，但是并未超越同中国的关系，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做出为了前者而牺牲后者的抉择。总之，对各方来说，都不希望看到南海成为“火海”。如果将视野放宽，从亚洲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高度看，大概除了美国军工利益集团和日本极右势力外，没有谁希望战火在南海燃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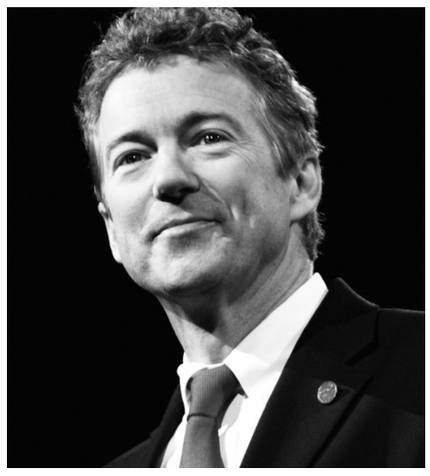
可见，对各方来说，南海都不是其国家利益中的优先选项。然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家之间往往会因为某项局部利益而走向冲突，从而摧毁双边关系基础，进而使总体关系逆转。这正是南海争端升级的危险性所在。对各方来说，一损俱损，没有真正的赢家。

解决南海争端需要树立合作共赢思维

对南海争端，当务之急是各方要冷静下来，克制冲动，防止冲突。特别是作为此轮南海争端“酵母”的美国更需要检讨其南海政策的利弊得失。涉及争端的东南亚国家也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国崛起是个客观进程，不可逆转，“遏制”只能延缓这个进程，而美国“重返东南亚”则是前景难测甚至可以随时改变的战略；此外，邻居是不可选择的，而霸权最终要衰落，中美实力对比变化的趋势仍将持续下去；特别是，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与东南亚在经济、文化上将进一步融合，其他方面的共同利益也会相应增多。

从长远看，各方需要摈弃零和思维，树立合作共赢思维。一个和平的南海对各方都有利，而维护南海和平的根本之道就是合作。任何一方都不应寄望将自己利益的获取建立在使它方利益受损的基础之上，更不应试图挑动其他几方恶斗而自己从中渔利。中国倡导的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应用于南海，就是除了要在共同利益上合作共赢外，还要通过合作来管控国家间的各种分歧和利益矛盾，从而使各方在分享南海和平红利上实现共赢。

人 物



茶党“先锋”兰德·保罗

□ 张 蓓

6月2日，参议院通过《美国自由法案》。两党就该法案博弈并投票的过程中，屡屡“上头条”的并不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大佬米奇·麦康奈尔，而是极力反对《爱国者法案》修正案，并利用议事规则拖延对《美国自由法案》最终表决的共和党“新星”、茶党“先锋”、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人兰德·保罗。

保罗1963年1月7日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孩童时期的保罗深受父亲影响。1968年全家搬至杰克逊湖后，保罗的父亲荣恩·保罗开始行医，一度成为当地唯一的产科医生。随后，他当选联邦众议员，13岁的保罗暑期就常常在父亲的国会办公室实习。思想方面，荣恩·保罗是坚定的宪法主义者、自由意志主义者。在父亲鼓励下，兰德·保罗少年时期学习了奥地利经济学家著作以及“客观主义”哲学家安·兰德的作品。

保罗1981年至1984年在贝勒大学学习，1984年因在美国医学院入学考试中获得高分，直接被杜克大学医学院录取，攻读医学博士学位。2008年，保罗为父亲做竞选演讲，引起媒体关注。2009年4月15日，保罗在“茶党”集会上演讲受到热烈追捧，激发其参选参议员决心。2009年8月，他宣布竞选克里斯托弗·邦宁退休后留下的参议员席位。2010年5月，他获得共和党内提名，并在其父人脉和资金帮助下，在共和党内初选中击败共和党领导层支持的候选人，声名大噪。

当选参议员后，保罗与吉姆·德敏特、迈克·李在参议院成立“茶党”党团，并跃升“茶党”旗帜性人物。随着“茶党”在美国政治生态中崛起，曾经“离经叛道”或“非主流”的保罗成为影响主流政治不可小觑的力量。他言辞大胆，自称“宪法保守主义者”，鼓吹无政府主义理念，主张限制国会议员任期，废除教育部和环保署，要求改革“统一式”教育制度，削减美联储权力，反对联邦政府介入毒品执法。经济上，支持减支减税，要求平衡预算修正案，限制对外援助等。移民问题上，虽然支持合法移民，但要求加强边境安全措施，认为国土安全部应建立有效签证追踪系统。医疗保健上，主张废止奥巴马医改法案，并将自由市场准则运用于医保体系。社会问题上，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甚至认为同性婚姻是一场“道德危机”。民权上，积极捍卫合法持枪权，抵制使用无人机，反对国安局个人数据搜集和《爱国者法案》延期。外交上，自称为“现实政治”思想而非“孤立主义”，实际上更贴近“现实主义”精神，对待乌克兰问题、叙利亚问题时前后表述矛盾不一。

2015年4月7日，保罗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正式宣布参选。实际上，早在2013年1月，外界已猜测保罗将成为共和党潜在竞选人之一。当年2月，他代表“茶党”回应奥巴马国情咨文，马克·卢比奥则代表共和党发声，媒体普遍将此解读为共和党党内初选率先打响。3月，他在华盛顿“保守政治行动大会”发言，并在2016年总统大选测验性投票中拔得头筹。随后两年，他再次在该投票中获胜。不过，大会参与者普遍为年纪较轻、思想较自由的共和党人士，不能决定共和党总体方向。

目前，保罗的民调支持率落后于杰布·布什、斯科特·沃克、马可·卢比奥等共和党竞选人，前景不容乐观。一方面，保罗选民基础并不牢固，其最大困难是如何吸引迥然不同的选民组合，包括追随其父“自由意志主义理念”的忠实拥趸、支持“小政府”及“参政保守主义”理念的“茶党”追随者、学生和非洲裔美国人等非共和党群体等。另一方面，保罗与共和党党内主流愈行愈远，尤其是他在《爱国者法案》上的反对态度得罪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以及其他重量级议员。麦康奈尔本是保罗竞逐总统的支持者，然而，保罗在《美国自由法案》最终表决时的“捣乱”让事情更为复杂。虽然共和党自由派团队为保罗撑腰，但未来他或将继续沦为党内“少数派代表”，赢得党内初选的希望都变得愈发渺茫。

英国大选后国内政治走向

□ 宋雄伟

2015年5月8日英国大选结果揭晓，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在总共650个议席中获得331个席位，超过议会多数，出乎意料地成为英国议会第一大党，赢得单独组阁权，这为推动保守党的政策理念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后盾。此次大选投票率达1997年以来历史新高，投票人数占全国人数的66.1%。2010年英国大选，英国出现“悬浮议会”局面，这也是英国政坛不太经常出现的现象。执政5年期间，因受自由民主党在内阁中的掣肘，英国传统意义上的“强势内阁”受到削弱。转眼5年已过，卡梅伦再度凭借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所取得的成就和政治策略，且在工党和自由民主党两大党派颓势不减的帮助下，赢得了“绝对多数”的席位。这为推动保守党的政策理念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后盾。笔者认为，卡梅伦在新的任期内将会秉承“大社会”的理念，进一步改革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给予地方和公众更多的自主权，改革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推行“大社会”理念

2010年至今，卡梅伦一直坚持“大社会”的执政理念，强调社区和社会公众的自治力量，相信责任更多地应该在政府与社会间共同承担。2015年卡梅伦执政后将继续在“大社会”理念的指引下推动各项领域的改革。包括：给予社区更多的权力，让社区居民（公民）决定社区的居住环境；鼓励社区居民更多地参与到社区服务中来，包括鼓励社区居民的志愿者活动；鼓励社区慈善行为；从中央政府转移更多的权力到地方政府，包括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财政自由权；下放必要的职能使地方政府更加具有竞争力；支持合作性的慈善机构和社会型企业，让更多的慈善机构、第三方机构以及社会型企业积极参与到公共服务提供；公布政府信息，使公民有权力获取关于政府的相关信息；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国家公民服务”培训，增强他们的服务能力，扩大视野和培育自信心。

继续推动透明政府建设

欧债危机的震动效应在英国还远没有结束，因此，卡梅伦上台后将继续加大力度推动政府节约、高效和透明建设，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政府赤字，缩减政府开支，建设节约政府。此外，还将通过政府电子化建设和信息公开等，建设高效、透明政府。新的任期，卡梅伦会马不停蹄继续推动这些改革进一步深化。在节约政府开支上，英国政府做出规划，预计将在2018年底每年减少100亿英镑开销，2020年底，每年减少约200亿英镑的开支。在建设高效政府上，卡梅伦将会进一步推动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使其更加适应时代的需要，着力重新规划公务员机构规模和形态，提升政策制定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构建责任机制，全面提升公务员队伍的整体能力素质，打造高效、专业和归属感的队伍。在建设透明政府上，卡梅伦继续通过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特别政府经费开销的公开，来推动透明政府的建设。



5月8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妻子萨曼莎到达伦敦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

改革福利体系 强化公共服务

在福利体系建设上，卡梅伦提出构建一个“更加公正的福利体系”，创造一种既能激励人创业奋进，又能给无论来自哪个阶层的人以公平机会和起点的体制。英国政府通过税收的调整推动福利体系的变革。例如：进一步提高收入税的起征点，将标准定到年收入12500英镑以上，这项改革直接使3000万人受益，免于交税；提高高额税收的起征点，将原来的42358英镑提高至50000英镑，使80万人免于交最高额的税收（所得收入的40%）。同时，为鼓励家长就业，减轻家庭压力，英国政府将免费儿童看护时间延长至每周30小时，相当于每年为育有三四岁儿童家庭节约5000英镑支出。总之，在福利体系改革上，卡梅伦将逐步推动“减少依赖，鼓励工作”的政策，建设一个“积极性的福利体系”，让人们通过工作改善生活，也以此减少政府福利开支的巨大开销。

另外，卡梅伦也将继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在社会公众最关心的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保障和住房方面下足功夫，以此来保证民众对保守党的持续支持。总体来看，卡梅伦对于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仍然呈现出“公共服务选择多样化，因人、因地权力下放，供给多元化，机会均等化和构建回应性的责任机制”的特点。在教育领域，继续推行“学院式学校”和“自由学校”的改革方案，意在通过“家长、社区或者慈善机构”的参与，推动教育服务供给的多元化和社会化，将更多的管理权限交给家长委员会。在医疗卫生领域，继续加大投入保证医疗服务经费充足，预计到2020年要增加80亿英镑的总投入。在就业领域，进一步释放企业的活力，通过税收政策，减轻企业压力，并由政府支持为年轻人提供充足的就业实习机会。在社会保障领域，承诺让每一位退休者过上有尊严的老年生活。在住房领域，扩大“购房权”计划的适用范围，使130万廉租户有机会以折扣价购买现居房屋。

向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放权

2014年苏格兰公投后艰难地留在了英国版图内，但这并不意味着苏格兰独立问题的终结。相反，随着这次大选，苏格兰民族党几乎将工党势力完全逐出了苏格兰，更加巩固了其在苏格兰的绝对优势。苏格兰独立问题并未因公投结束而消失，反而通过此次选举而被进一步放大。要想将苏格兰继续留在英国的政治版图之内，卡梅伦的新政府将在未来面临艰难的政治博弈。笔者认为，卡梅伦政府为了维持苏格兰的暂时稳定，会按照苏格兰公投时的承诺进一步将权力下放给苏格兰，实际上几乎形成了英国特色的“联邦体制”。同样，受到苏格兰问题的影响，英国政府同样也将进一步将权力下放给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在威尔士议会的问题上，英国政府进一步将政治权力（威尔士议会的规模，名称，选举制度，选民年龄等问题）和经济权力下放给威尔士议会。在北爱尔兰问题上，英国政府将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权力也进一步下放。

环球瞭望

《自由法案》：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之争

□ 李 默 孙成昊

6月1日零点，《爱国者法案》失效，美国国安局经历了两天的监控授权空白期后，5月在参院受阻的《美国自由法案》终于在6月2日以67对32的高票通过。这是自斯诺登两年前披露国安局“棱镜”计划以来，美国国内大规模监控项目的一次重要改革。自法案生效后的6个月内，国安局需将大规模通讯数据的搜集和储存工作转给电信公司；且今后在因调查涉恐活动需搜集通讯数据时，须先取得外国情报监控法庭许可，除非紧急状态，不可直接向通讯公司索取数据。

《自由法案》终结了美国国内大规模监听时代，使打着“反恐牌”的政府必须在确定特定用户或通讯终端后方可搜集监控其通讯数据，以往那种“无差别”的大规模监控将一去不返。《自由法案》的通过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观的理性回归，反映了美“唯国家安全与反恐至上”论调的偃旗息鼓，个人隐私权重获重视。

保障国家安全与维护个人隐私权似乎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前者由于“9·11”的阴影而显得十分紧迫，后者所体现的自由主义则是美利坚立国之本；前者时刻面临着严峻的现实威胁且损害结果可能极其严重，后者则是美国人最引以为豪和珍视的东西之一。二者矛盾如何调和是美国面临的一道难题。

事实上，“9·11”后，美国社会就隐私权与国家安全孰轻孰重一直争论不休。信息技术时代的隐私权和国家安全皆面临巨大挑战。当时，美国步入“恐惧时代”，几乎所有人都担心恐怖主义“卷土重来”。只要这种恐惧感一息尚存，国安局和其他安全机构都似乎有权以人民的名义采取反恐所必须的各种手段，甚至不惜侵害个人隐私权来阻止可能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

在斯诺登披露美情报部门的大规模监听活动后，美国社会开始对政府监控大规模抗议。媒体掀起讨论热潮，反思美国面对的恐怖主义威胁是否值得牺牲如此之多的隐私权，或者说，这些大规模监听活动真的有助国家安全吗？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春的民调显示，54%的受访者不同意政府因反恐需要大规模搜集电话和网络数据，多达74%的人表示不愿因为“安全”放弃“隐私和自由”。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已经逐渐滑向自己最反对的专制国家，而“棱镜门”事件不过揭开了冰山一角。美国政府几乎监控了民众的一言一行，美国安局将获取的信息传递给联邦、州和地方一级的机构，利用这些信息打击小偷小盗。同时，这些机构还会得到指示将信息“洗白”，伪装成是以合法的手段获取了这些信息，以免让辩方律师抓到把柄。比如，美国把搜集到的敏感情报交给以色列、英国等其他盟友，然后这些盟友再转回给国安局“洗白”。这些手段都让美国一步步滑向专制的“警察国家”。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早在2013年底就迈出了调整“安全”与“隐私”关系的脚步。白宫曾在2013年12月18日公布“情报和通信技术总统审查小组”撰写的改革方案报告，题目为“变化世界中的自由与安全”。报告长达308页，提出了多达46项改革建议，其中一条便是建议国安局停止对电话信息的存储，把数据交给电话公司或者第三方，之后获取数据必须经过外国情报监视法庭同意。报告的总结部分点出了改革方案的核心观点：“美国应该给予非美国公民更多的隐私保护。”

本质上看，美国人之所以如此注重“隐私”，是因为这个概念与“自由”息息相关，而“自由”正是美国文化的核心。可以说，有自由的美国才是美国，失去了自由的美国也就失去了灵魂。

安全与隐私从来都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二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达到平衡，《自由法案》就是这样一部试图平衡二者关系的法律：既想保证国家安全、有效反恐，又能顾及民意，保护隐私权，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从《自由法案》的例子中，我们看到美国政治具备一定的自我调整和修复能力，总希望在社会思潮和政治决策中，避免矫枉过往正的摇摆和明知故犯的愚蠢。整个国家机器的政治思维和决策指挥在《自由法案》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自由法案》或许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成文法的制定往往需要有成熟的习惯法和相对统一的社会认知作为基础。“权力”需以“权利”为基础，“权利”须以“权力”为保障，二者的辩证关系与安全和隐私的关系如出一辙。

然而，《自由法案》的实际效果暂且不论，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作用却是事实。法案仅对国安局的国内监控项目，而非海外监控。即美在海外的大规模监控仍将继续。电话监听并未被禁止，只是程序上受到限制，情报部门需先取得法院许可方能开展活动。从这个层面看，与其说隐私权在与国家安全与反恐的这次交锋中大获全胜，倒不如说其做出了一定妥协与让步。政府的监控行为当然无法喊停，隐私权保护除了多加几层“保险”别无他法。兰德·保罗可以高呼“绝不用自由换取安全”，因为他想角逐下任总统宝座。为了拉选票，政客常常“剑走偏锋”甚至哗众取宠。但在大部分美国人看来，麦康奈尔的“唯国家安全至上论”似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全然不顾民意，也非智者之为。不过，大部分美国政客是清醒的，大势所趋下找到平衡点，博弈双方暂且各退一步，这才是所谓的政治智慧。

西方社会